

戴景賢

粵清學術思想史論集

上編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戴景賢

PDG

戴景賢 著

程學閣著作集之一

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
上編

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

程學閣著作集之一
《明清學術思想史論集(上編)》
戴景賢 著

© 香港中文大學 2012

本書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所有。除獲香港中文大學
書面允許外，不得在任何地區，以任何方式，任何
文字翻印、仿製或轉載本書文字或圖表。

國際統一書號 (ISBN) : 978-962-996-485-6

出版：中文大學出版社
香港 新界 沙田 · 香港中文大學
圖文傳真：+852 2603 7355
電子郵遞：cup@cuhk.edu.hk
網 址：www.chineseupress.com

封面題字：清華大學中文系系主任劉石教授

Book One of the Chengxuege Collection
An Anthology of the History of Ming-Qing Academic Thought (Part I) (in Chinese)
By Tai Ching-hsien

©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
All Rights Reserved.

ISBN: 978-962-996-485-6

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
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
Sha Tin, N.T., Hong Kong
Fax: +852 2603 7355
E-mail: cup@cuhk.edu.hk
Website: www.chineseupress.com

Printed in Hong Kong

目 錄

上 編 導 言

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之議題與方法	1
一 明、清研究如何相互關連成為史學議題	1
二 明清學術史、思想史研究之主要議題與其研究之關鍵點	5
三 建構有關明清學術史與思想史之一種詮釋： 本論集所擇取之關切重點與研究策略	9

壹 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 ... 29

前 言：如何確認陽明學位居於中國哲學史之關鍵位置	29
一 陽明作為中古哲學之終結者之意義及其思想與朱子之對比 ..	30
二 陽明學作為奠立「近代哲學」基礎之意義及其開展	43
三 陽明學成後證境之三變與其所示現之工夫門徑	50
四 陽明學之儒學面相及其特性	55
五 陽明哲學之系統建構及有關其教法流衍歧異之分析	61
六 陽明學說依性質可產生之哲學效應	72
七 陽明學說依性質可產生之儒學效應	79
結 語	86

貳 論陽明與象山思想之關連及其差異 113 |

一 陽明論象山所謂「細看有粗處」	113
二 陽明、象山差異所表現之形態殊別 與陽明「格物」說所呈顯之儒學意義	119

三 「朱、陸異同」議題之基本性質 與陽明所以承接於象山論說系統之難題	128
四 陽明對於象山難題之解決	138
五 陽明所引生「朱、陸異同」問題性質之改變.....	141
參 論姚江學脈中之龍溪、心齋與其影響.....	157
前言.....	157
一 心齋、龍溪二人立論之相近與辨析其思想異同之線索	158
二 王門中有關「天泉橋證道」一事之述記及其所引生之爭議.....	160
三 「四無」、「四有」之說作為王門教法之「證言」意義 及其所生發之影響	165
四 龍溪立言本意及其與心齋之不同	170
五 龍溪、心齋之影響	173
六 龍溪、心齋之別派與卓吾、泰州之關連	178
七 「李卓吾效應」與其所以造成影響之原因.....	182
八 李卓吾與焦澹園	186
結語.....	190
肆 論明代美學思想發展之結構性質及其與形上學之關係	213
一 明代思想發展中之「近代特質」及其主軸.....	213
二 美學性思惟因素如何介入明代形上思想之發展	215
三 明代美學與形上學思想交會時之議題建構 與二者間之初步互動	223
四 明代思想發展中美學性思惟 如何以「方法」之意義融入其形上學建構.....	229
五 明末清初儒學以形上思想整合美學之一種形態 以及美學之衰落.....	235

伍 論方以智王船山二人思想之對比性 與其所展顯之時代意義	257
一 方以智、王船山之學術來歷、思想處境 與其所各自面對之關鍵議題	257
二 方以智、王船山二人思想之基本架構及其性質	276
三 方以智、王船山二人思想表現於學術作為之展示性	290
四 方以智、王船山建構論述之根本預設與其致異之根源	302
五 方以智、王船山二人思想之對話性及其所展顯之意義	311
人名索引	353
書名篇名索引	361
觀念詞條索引	369

明清學術思想史研究之議題與方法

一、明、清研究如何相互關連成為史學議題

明、清二代研究之於現今，相互關連，成為史學議題，約有三項起因：一項關涉中國史之歷史斷代；一項關涉明、清歷史發展之延續性；而另一項，則是起自詮釋「文化發展」之理由。

所謂關涉「中國史之歷史斷代」，重點有二：一為如何界定「中國近代史」之起源，並說明其條件。其二則是，因於社會經濟史之「形態」分析，發現明、清社會經濟發展之關連性，並以此提出有關其社會結構與功能之議題。對於前者而言，無論論者之主張「近代」(the modern era)，必須以「工業資本主義」(industrial capitalism)之成熟，作為條件，因而排除「前近代」(pre-modern)之資本主義萌芽，具有「晝分時代」之依據；或主張所謂「近代」，可以有不同於「歐洲典型」之晝分標準，因而企圖另尋一種「世界史」詮釋之可能，明、清史之關連研究，皆屬必要。就後者言，由於西方經濟史議題與方法之運用於中國，具有「實證」基礎之中國近現代經濟史研究，已逐步建立與文獻研究間之關連，故將此一取徑延伸，明、清社會發展之延續性與相關性，已有具體之研究對象；並亦獲致可觀之成就。此一結果，不僅改變歷史家之歷史想像，並形塑另一種重新定義之「歷史斷代」之可能。

而所謂關涉「明、清史自身歷史發展之延續性」，重點則有二項：一項關切之眼光，來自社會史中分別論述之「結構」與「功能」之議題。於此類議題之導引下，清末中國體制之崩潰，開啟中國史之新頁，逼迫有關明初以迄清中之歷史研究，發展成為可與「近代變

局」相對比與相關連之段落。明、清史之相關研究，因而常具有一種親切性。

另一項關切之眼光，則來自中國傳統史學與近現代新史學之銜接。就傳統史學而言，其史學之意識，來自儒學，而其史學之「近世議題」，則來自兩項：一項奠立於關於「明史」之反省；從而亦使「宋史」成為關切之焦點之一。另一項，則係由清末視當時之鉅變為「千古未有之變局」所引發，從而使「以中國文化為本位之通史意識」，產生屬於儒學觀點之焦慮；明、清史之研究，因此被賦予特殊之意涵。而就近現代所謂「新史學」之角度而言，「中國史」既必須被放置於一「世界史」之脈絡中加以理解與表述，則如何建構具有新內涵之「通史意識」，成為必要。於此需求下，屬於「儒學觀點之焦慮」，經轉換成為一種屬於新形態人文精神之「文化焦慮」。明、清史之受注意，由是帶有一種新的歷史意識。

至於所謂「起自詮釋『文化發展』而有之原由」，其重點亦有二：一為發現「思想史」與「社會史」之連結。而另一則是針對政治體制、權力運作，與「智識階層之社會功能」間之關連性所為之探討。就前者言，此項連結所產生之思惟，賦予學術史、思想史之研究，以新的意義，並由此引生大量前所未有之議題；連帶亦使「智識階層」之活動史與心靈史，具有詮釋中國社會與中國文化之重要性。明、清二代之研究，由於其時代之接近，與史料之豐富，因而備受注意。就後者言，此一關係之重新發現，對於長久以來之儒學論述，產生衝擊，並大幅影響中國智識份子之自我認知與價值觀。「人物」、「思想」與「時代」之關係，由是展現極為豐富之面相。明、清智識份子之心靈史研究，由是成為中國新時代智識階層反省自身之重要參考。

以上所述為明、清於當前學術研究中，如何相互關連成為史學議題之三項起因；其中之第三項，為明、清學術史與思想史之研究，提供視野，並賦予其研究以一種「時代」之意義。而就「學術史」、「思想史」與「社會史」三方面研究之具體操作方法而言，則有數項普遍原則，應予考量：

首先當釋明者，為「學術史」、「思想史」與「社會史」之關連問題。一種「決定論」(determinism)之方式，如馬克思主義論者之所持，係

以經濟生產與分配方式之改變，作為「社會演化」(social evolution)之主要決定因素，故有關「思想史」之詮釋，其實皆屬其「社會史」觀點之延伸；如何為「社會結構」定性，成為必當解決之基準問題。於此類論述中，論者所追求之詮釋目標，為「系統性」之完整，與伴隨其精確定義而有之「嚴密性」。對於其它「非定論主義者」而言，則二者間之關係，無必然之因果。一切詮釋之建構，皆屬「面相之可能」，其意義在於提供一可供歷史反思之「關係之連結與架構」。唯於其間，亦常由於「詮釋方法」之廣為他人承襲、擴充與應用，因而形成一暫時居於主流之意見。「韋伯(Max Weber, 1864–1920)議題」之逐漸於明、清研究中發酵，即是一例。

唯就中國社會自身之特性而言，儒、釋、道三教之於中國，有其因歷史發展而形成之特殊性，並非皆可以一般「宗教社會學」之眼光視之，或完全處理。中國儒、商間關係之討論，亦涉及一般義之所謂「東亞社會特性」，¹或「中國社會延續性特質」之問題，必須以不同之角度，分別處理，而後加以關連與融會。難於僅以單一議題，或單一向度，而為整體之詮釋。

然亦正因此，學者於其研究之實績中，彼所真正處理之議題，與所延伸處理之議題，其所能產生之效益不同。學者或因處理「延伸議題」時之偏見，因而影響其處理「真正議題」之可見；或雖於真正處理之議題有所見，卻因而造成於延伸議題之處理時，由「執見」而產生偏見。以「關係連結與架構」為核心之論述意見，所以常見為紛雜，或相濡、相結以成門戶，其因在此。雖然，事久而論定，或雖無所謂「定」，其持之有故者，可歷久而不衰；此種或可寬鬆定義為「關係論」²之取徑，仍於研究之意義上，有其實質之進展。

第二項當釐清者，為「學術史」、「思想史」與「社會史」三者論域與脈絡之分野。此種論域與脈絡之分野，係建立於二件有關「事實」之認定：一為人類「精神」與「思想」之獨立性。此處所謂「獨立」，非謂其存在不須依賴其它條件之支撐，亦非謂思想與觀念之發展，皆係其自身之內涵所演繹，或自另一觀點言，具有某種不可剝奪之「客觀性」。而是指其存在之樣態，不全由其它條件所決定。於此排斥「決定論」之說法，亦同時不將「社會史」之論述，放置於「優先」之地

位。另一，則是哲學性思惟之邏輯性。此所言「哲學性思惟之邏輯性」，非意指「邏輯性思惟」乃哲學性思惟之唯一方式，或必要方式；亦非謂「智慧」僅止於表現為「哲學性思惟中之理性」。而係承認「邏輯性思惟」於哲學性思惟中之功能，且於此功能中，排斥其它哲學立場之干擾。

至於具體說明「學術史」、「思想史」與「社會史」於論域與脈絡中之分野，則可有三層步驟：第一層步驟，應將「哲學突破」(philosophical breakthrough)與「學術觀念之建立」，作為畫分人類思想歷史，由人類學所界定之原始形態，進入理性文明之兩項機制；原創性學術思惟之方法構成，與其發展、變化與傳播之可能，及其限制，由是成為學術史觀察之骨幹。學術思想史與文化發展中所存在之思想史之其它面相，亦因此得以區分。

第二層步驟，基於「學術」、「思想」與「社會發展」相互間之影響，應注意其「互動方式」之形成，並判別各種「作用」所由產生之界域與類型。

第三層步驟，則應於三者各成脈絡之發展中，尋求其本身之歷史段落，然後加以連繫。於此觀點中，三者間之關連，係由「影響」之機制所造成，而非由單一因素決定。唯對於宏觀論之史家言，社會經濟史與政治史中所存在之形態論與結構論，仍是決定「一般史斷代」之基準。

至於就「學術史」、「思想史」與「社會史」三方面研究之具體操作方法而言，第三項應予說明之普遍原則為：三者之發展，由於各文化體間「文化特性」之不同，可能形成自身之特殊性，因而研究時，必須關注其歷史積累所形成之豐富特質。唯此種特殊性，並不限制其變化之可能；變化之可能，係由「條件」與「需求」所決定。此種「特殊性」之理解，亦不否定一種普遍之「世界史觀」之可能；雖則「世界史詮釋」，止應為一歷史研究之目標，而非建構一切歷史解釋之基礎。

以下所將論述者，為有關學術史與思想史研究方面，因於明、清史之特殊性，從而產生之特殊面相，與其運作方法上應有之考量：

二、明清學術史、思想史研究之主要議題 與其研究之關鍵點

明、清學術與思想之發展，如以傳統之觀念予以審視，可有二種設立之觀點，與可展示之取徑：一為依儒學中「四部之學」之概念而有之「流變」觀；一為依「三教」義理概念而有之「宗主」觀。

由前項觀點，產生「理學作為『儒學』之意義」之評斷、「經學」與「理學」關係之討論、「經學」與「史學」關係之分疏，乃至「漢、宋」、「今、古文」之學派分野。

由後項觀點，產生道、釋二家之宗派論述，與理學家言中之「教法」概念。並依其義理需求之相通與立場之融會，形成不同形態之所謂「儒、釋會通」或「三教合一」之詮解。

此二種觀點，前項之思惟，雖具「哲學性」與「史學性」，然「哲學」與「史學」之方法學批判，皆係於儒學者之思惟中，以其所選擇之方式，於其所選擇之議題中進行，並未有一種完整之哲學系統之「學術形式」為之統整。「儒學」仍是奠立其觀點之基礎。後項之思惟，雖牽涉直觀性之信仰，然其所追求之義理目標，皆須由個體之修證抉擇；因而產生「宗教」與「學術」間之對話。於此意義上，歷史性之詮釋，並非重點。「義理」之分辨中，無可避免存在「門戶」之爭議者，在此。

至於藉助西學所逐漸建構與釐清之「學術史」與「思想史」觀點，以論述明、清學術與思想之發展，則可分說為四項主軸：

第一項主軸，係以西方之「哲學」觀念，釐清學術思惟之本質，學術領域之界域，與學術性議題之分際；並嘗試建構中國學術之「方法論」詮釋，以此結合傳統觀念中之「流變」觀，為學術史研究，奠立基礎。

第二項主軸，係以「觀念演變」、「思想傳播」與「社會影響」之角度，看待「思想」於文化中所扮演之角色；以此吸納「宗教信仰」與「義理學」之議題，並處理傳統思惟中所無法面對之「宗教史」，或所謂「社會思潮」問題，從而得以建立觀察與研究之角度。

第三項主軸，係欲於建構中國「學術史」與「思想史」之歷史詮釋之同時，將此二項詮釋之所得，融入於「世界史」之理解中。

第四項主軸，則是企圖以「學術史」與「思想史」相結合之方式，探討中國人文思惟與其價值觀之未來。

以上所述「傳統」與「藉助西學」之二種觀點與取徑，若以學術可表述之形式，或歷史理解之面向而言，自是以後者之運用，較能符合「現代知識」之需求；因此亦於發展中，迅速取得優勢。然傳統之思惟，係與傳統之學術，乃至其義理觀念相關，故倘僅以現代西方之觀點與方法為基礎，而於前人之思惟方式與其價值觀懵然無知，則於閱讀相關之文獻史料之過程中，必難於適切進入其語境，獲得較為近實之認知。故研究傳統智識份子個人，乃至智識階層之活動史、心靈史，研究者於其個人之內心經驗，乃至精神歷程中，嘗試體驗研究對象所採取之義理取向，由此探討有關「人性發展可能樣態」之意義，仍為建構「有效詮釋」之重要步驟。「智識階層史」與「人物個案」之亦成為受矚目之研究項目，其因在此。

觀點、取徑之外，現階段有關明、清學術與思想發展之研究，約有多項較受注意之議題，可約說之如下：

一、陽明(王守仁，字伯安，1472–1529)思想之義理內涵，與其哲學建構之根本性質。於此討論中，陽明思想之受注意，不僅在於其儒學意義，或義理學意義，亦在其「思想形態」之哲學說明。

二、陽明學與朱子(熹，字元晦，1130–1200)學之對峙。此項關注，起於自來所謂「朱、陸異同」之儒學問題。然以今日之眼光視之，陽明與朱子思想之差異，本有其哲學上不同之系統建構，此一哲學立場之分別，既無法調和，亦不必調和。至於何者於學術與思想之發展有利？何者不利？於何有利？於何不利？則有「以儒學觀點而論」，「以非儒學觀點而論」，「以純粹義理學角度之觀點而論」，或「就其可能之延伸性發展之角度而論」之不同，必須加以區分。至於以更為宏觀之角度，看待有關明、清學術與思想發展中，陽明學與朱子學之長期對峙，則其所牽涉之議題，猶不僅在於陽明學與朱子學於儒學意義上所展現之影響差異，亦在此種影響下之學派發展

中，隨人物、氛圍、議題與價值取徑之不同，所產生之變化。皆須以「學術史」與「思想史」之角度，分別加以處理。

三、陽明後，所謂王學流衍之分派，其起因為何？是否即是一種分裂？若是一種分裂，其哲學意義與思想史意義，分別為何？其中屬於激進之一派，其與當時文學發展中之美學思潮，乃至由社會經濟變化所帶動之思想發展，關係又為何？皆應以新的觀點，加以論述。

四、明代哲學思想之發展，於程朱與陸王之對峙外，是否尚有其它發展之線索？此種線索是否足以說明明代「氣論」之轉折，甚至一種「唯物」思想之發展？

五、明代中晚期社會經濟發展之形態轉變，是否帶動一種思想之趨向？此種趨向之性質與意義為何？是否同時亦展現一種智識階層結構性質之改變？其結構改變之意義何在？

六、明、清時期所謂「士」、「商」合流之現象，係於何種條件下發生？其範圍與交涉之程度為何？其所反映於價值觀之改變者，有何特徵？此特徵之「社會史」意義為何？

七、明代文藝思潮中有關「藝術論」之思惟課題為何？其討論是否反映相應而有之哲學思惟與社會思惟之立場？其中有關「性」與「情」、「欲」之探討，其主脈為何？各家之主張中必要之哲學預設為何？

八、明末各種形態之三教調和論，其各自發生之原因，發展之過程，與主張之核心之義為何？

九、明末以至清初西學之輸入，其過程、內容與所造成之影響為何？

十、明末清初作為學術史與思想史之轉換階段，其產生之動力，與發展之各式樣態為何？於其多元之走向中，是否存在一種一致之趨勢？其哲學史與社會史之意義為何？

十一、「清學」之概念，於何建構？如何建構？影響其建構之觀念來源為何？清學之主體性為何？「清學發展」之詮釋，是否應區分階段？各階段間彼此之關連為何？於此觀察下，清初、清中，與清之季世，其所應受關注之議題為何？

十二、於清初以迄清中之發展中，政治力對於學術之影響為何？如何加以細緻之分析？

十三、清初所謂「格致」之學，其方法學上之認知，與前此之理學觀點，有何不同？

十四、清代理學發展之脈絡，及清初「朱、陸之爭」之樣態為何？

十五、所謂「考證學」，其核心之定義為何？言考證而論及「乾嘉考證學」，其所指涉之對象為何？如何界定其範圍，並論述其方法？「乾嘉考證學」是否存在吳、皖之學派區分？「考證學」之建構，與設立所謂「清學」之概念，有何關連？

十六、「漢」、「宋」之爭自何而起？其內容為何？其所造成之影響又為何？

十七、戴東原(震，1724–1777)與章實齋(學誠，1738–1801)二人學說理論之內容與重要性為何？

十八、清初以迄清中之史學，有何發展？

十九、清代之文論、藝論，及其相關之美學論述，其所關注之焦點，與理論之建構為何？

二十、清代桐城派之古文義法，及其儒學觀為何？桐城文派之流衍對於清中晚期之學術影響為何？

二十一、嘉、道、咸、同之學術變化，其內容及時代意義為何？

二十二、龔定庵(自珍，字璣人，1792–1841)、魏默深(源，1794–1851)之影響，及所謂「晚清今文學運動」之實況為何？

二十三、清末之時代變局與清末實學。

二十四、西學之輸入及其所造成對於中國學術之衝擊。

二十五、清中期以來之儒、佛交涉，與其因應西方思想輸入所引發之思想議題。

二十六、清末中國學界之新思惟，與其形塑之過程。

二十七、中國近現代思想史中，是否存在一種近於所謂「啟蒙運動」(the Enlightenment)之思想發展？若有，其意義為何？

二十八、由晚清進入民國之學術與思想發展，與同一時期中國智識階層之轉變，其關連性為何？而所以致變之因素又為何？

以上各項議題之呈現，既有其延伸性，亦可發展出「不同之組合」；皆由學者對於議題之不同認知所決定。

三、建構有關明清學術史與思想史之一種詮釋： 本論集所擇取之關切重點與研究策略

明、清學術與思想之發展，雖如上所言，已於具體之研究中，形成種種可聚焦之議題，然對於企圖關照其整體歷史進程之學者而言，任何局部研究之分析，皆屬整體詮釋之一部，且亦不可避免帶有整體詮釋之意識。此種相互回饋之思惟，與質疑已有之整體詮釋，企圖以局部議題之研究，開拓新視野，或新觀點之作法，可謂各有利基；亦同時各有其限制。對於學者而言，如何兼取二者，而又能於其間，時時更新己見，具有極高之難度，亦難臻完善之境。

本論集於寫作之過程中，於明代部分，所採取之策略，係以「哲學」與「義理學」為骨幹。蓋就學術而言，明雖承自宋、元，然以其中關係最鉅之理學而言，象山（陸九淵，字子靜，1139–1193）、慈湖（楊簡，字敬仲，1141–1226）一脈，得白沙（陳獻章，字公甫，號石齋，1428–1500）、陽明出，已建構不同於「程、朱」之系統形態，且二種形態之於哲學中對峙，以今日之理解言，各有其「不可替代性」；其義理主張，亦因此獲得支撐。故較論所謂「朱」、「陸」之異同，要點已非僅以概括性之儒學立場，或單純之「理學」概念，即足以釐清。「哲學」與「義理學」之條理分析，因此成為關鍵。至於明代智識階層之其它思想發展與學術取徑，則由於姚江學於明代之廣布，與其所佔據之優勢地位，無人能無視於其影響，故一切相關之詮釋，亦必待陽明教法及其流衍之脈絡，獲得澄清，始較易形成完整之理解。此一部分具有應優先處理之重要性。

其中有關「哲學史」部分，本論集作者所擇取之觀點，在於抱持一特殊之看法，即視陽明為前、後居間轉換之關鍵，其本人既為中古哲學之總結者，亦於其自身之系統中，奠立部分「近代哲學」(modern philosophy)之基礎。關於第一項，所謂「陽明為中古哲學之

總結者」，其要點有三，即：一、陽明心學，在作為整體理學之共同發展上，已完成朱子系統之外，另一可有之對立形態；而此二種形態，對於理學思想所蘊含之各類成分，具有最大程度之涵括力，為其它各家所不及。二、程朱與陸王之理學系統，雖有極大差異，然皆於「道體」，乃至「心體」之觀念內涵上，各自主張一種特殊義之「圓滿性」(perfection)與「恆常性」，代表「中古後期」儒家哲學之極致表現；具有於某一意義相類近之趨向。三、陽明據其「知、行無間」之說，主張「涵養」與「察識」之一體，基本上已解決宋以來心性修養論中有關二者孰先孰後、孰輕孰重之難題。此後遵朱子之教者，雖皆大致持守朱子「居敬」、「窮理」之說不屈，然如未能更有所進，將陽明之所言，融入朱子之說，從而有所更義，或補充，而僅是株守其已有之論，則於此等關繫心性修養之精微問題上，必難有所拓展。明末以後，朱子學之流衍、影響，實質上亦逐漸偏向經、史一路，即是展現此一發展之態勢。就大趨而言，朱子學已不易於義理學方面，維繫其較前時期之「統合」功能。陽明學專就此點言，具有優勢。

關於第二項，所謂「陽明於其自身之系統中，奠立部分『近代哲學』之基礎」，其要點亦有三：一、陽明思想由於一面強調「良知本體」之超越性(transcendence)與自在性，將人之意識與潛意識中一切「觀念」之深植，皆視為具有障礙本心之可能；而於另一面，則主張物與物間之感通，本身即是一種精神性之「動態存有」。此二方面之和合，展顯其哲學於「存有學」之特徵上，具有一種可歸屬為近代哲學中所謂「動態主義」(dynamism)類型之特質。此種特質，具有與朱子之說截然不同之伸展性，³成為以下中國哲學進一步開展之部分啟示根源。二、陽明哲學將每一單獨之個體，詮釋為一切「義理抉擇」所從出之主體，並期待此一「自我決定其命運」之意志之承載者，同時亦成為「社會之理想成員」。此種理想，雖與「早期近代」產業轉型所帶動之社會生活之改變，乃至社會「躁競」之風尚，非屬一脈，然由「早期近代」趨向「近代」之社會發展內裡，實亦有「期待善用教化功能，以提昇社會均平之教養，從而將全社會引往更高文明之境」之深層需求；故一種以「教化庶民」為觀點之道德理想主義，依然有

其不容輕忽之文化意涵，值得論者以區分層次之方法，加以審視。三、陽明哲學內部具有多層次之殊別義涵，故其思想所具有之近代特質，若結合於論者不同之心性經驗與事物理解，可推演出歧向之思想體系，從而富裕發展之空間，於哲學之開拓有利。

本書論文綜合以上各項要點，及其延伸之議題，將有關陽明之研究，集中於探討其哲學之根本性質，與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。其研究概分為九部分，即：前言：如何確認陽明學位居於中國哲學史之關鍵位置。一、陽明作為中古哲學之終結者之意義及其思想與朱子之對比。二、陽明學作為奠立「近代哲學」基礎之意義及其開展。三、陽明學成後證境之三變與其所示現之工夫門徑。四、陽明學之儒學面相及其特性。五、陽明哲學之系統建構及有關其教法流衍歧異之分析。六、陽明學說依性質可產生之哲學效應。七、陽明學說依性質可產生之儒學效應。結語。（說詳本論集〈王陽明哲學之根本性質及其教法流衍中所存在之歧異性〉一文）

其次關於陽明研究所必將觸及之「陸」、「王」差異問題。本書論文，由陽明成學之經歷，乃至陽明對於象山之評論，追溯之於陽明所以殊別於象山之關鍵點，由此細辨二家於立論上之差異。並以思想史與學術史之角度，說明象山與朱子之對峙，於哲學史與儒學史上之意義，乃至陽明所企圖完善象山之說之精義。同時將所謂「朱、陸異同」於宋、元，乃至明初所引起之思想導引作用及學術影響，分別予以釐清。其論述之脈絡，除解析陽明與象山思想之關連，及其差異外，亦以比較之方法，討論陽明立說後，其所引致「朱、陸異同」問題性質之改變。

至於明代「義理學」之脈絡部分，本論集作者所選擇之論述重點，除於說明王學之哲學性時，所必然觸及而為討論者外，另有二項重點：一在分辨「陸王學」中陽明與象山之差異；一在分辨王學流衍中，龍溪（王畿，字汝中，1498-1583）與心齋（王艮，字汝止，1483-1541）之不同。

關於陽明與象山思想之形態殊別，本書論文大體於二方面言之：一於哲學，一於儒學。於哲學方面，主張陽明與象山之異，在於象山之「理一」論，乃建構於其「性一」論之上。而陽明則是於